

丝绸路上的  
外国魔鬼

**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

[英]彼得·霍普科克著

杨汉章译 宋子明校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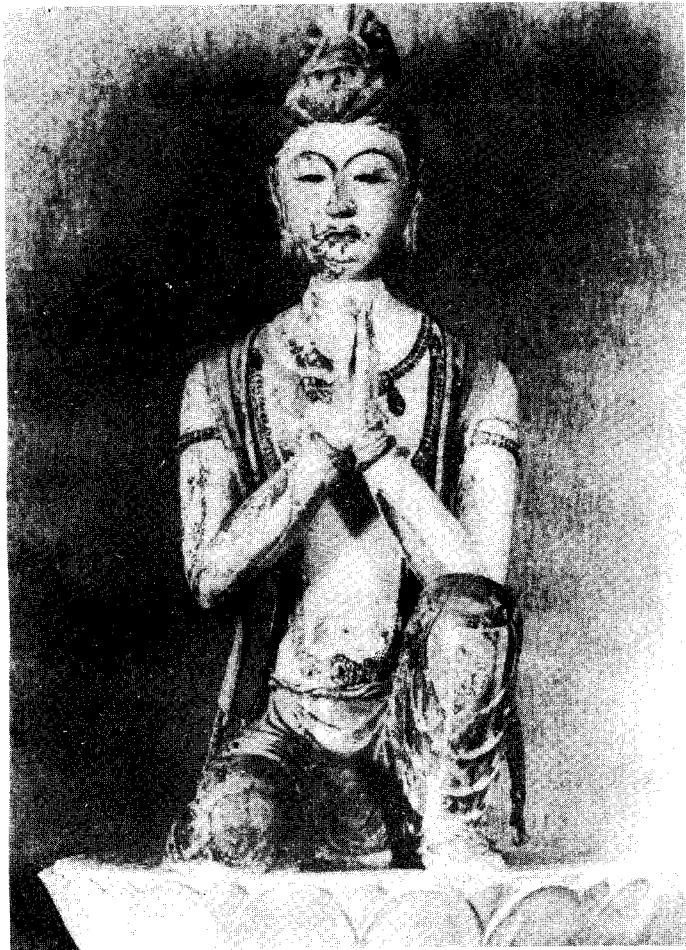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375 插页：2 字数：180,000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

书号：11096·64 定价：0.86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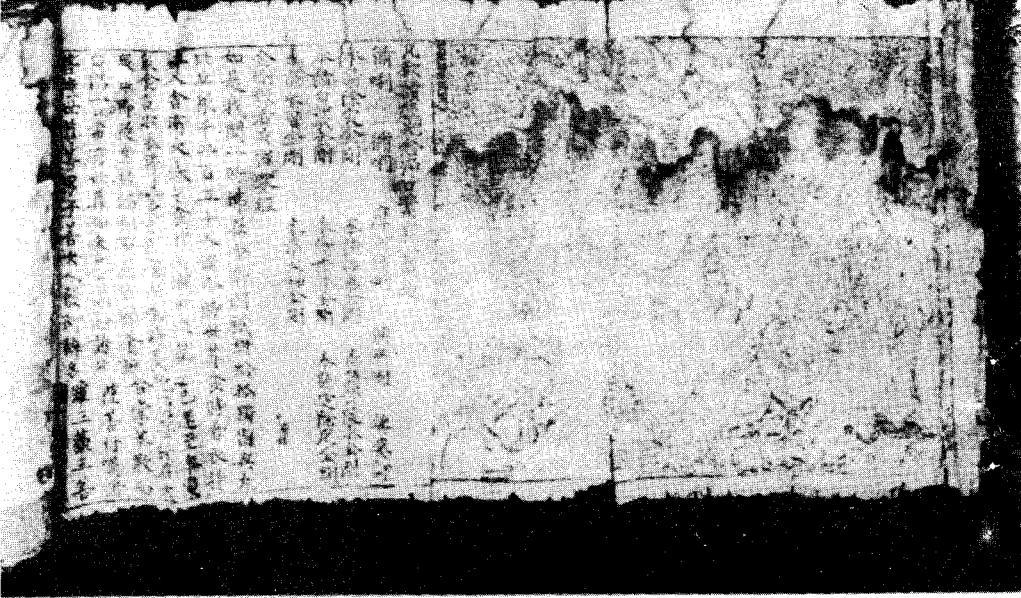
兰登·华尔纳从敦煌拿走的跪姿菩萨像。



范莱考克从伯兹克里克拿走的九世纪大型壁画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于柏林被毁。请注意上面切割的痕迹。此系西域风格的一个典型例子。

长期失传的伯兹克里克杰出作品的另一部分，显示寺庙的波斯供养人像，亦毁于炮火。





从秘密书库中取出的世界最古老的刻版印  
刷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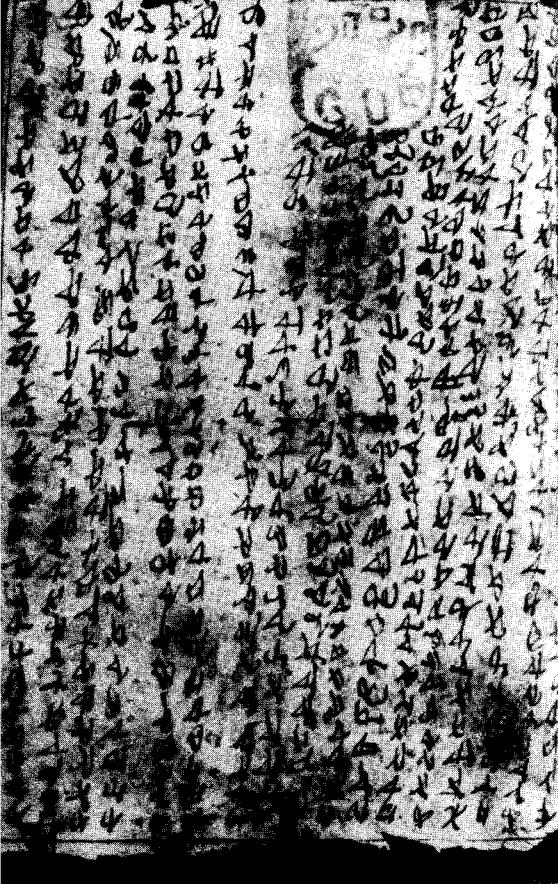


敦煌密室中的手卷捆束。



取自伯兹克里克，显示印度僧侣形态，亦  
毁于二次世界大战。

以“陌生文字”写成的  
阿克亨赝品的样本。已从英  
国博物馆收藏所撤除。



从伯兹克里克拿去的真人  
大小的佛像，描绘中国的僧  
侣形态，毁于二次世界大战。



自命为敦煌保卫者的王道士。



图左：兰登·华尔纳教授  
图右：伊斯兰教  
徒阿克亨 奥利尔·斯坦因爵士摄



保罗·伯希和教授



大谷光瑞伯爵



斯文·海定



奥利尔·斯坦因爵士

## 序

《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是英国彼得·霍普科克先生写的一本好书，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一群强盗劫掠我国文化财宝的历史。

全国解放前的近百年中，古丝绸之路的西域地段（我国新疆地区，包括敦煌在内）变成了盗宝者的乐园。俄国的柯兹洛夫、奥布鲁切夫、克里门茨，德国的德兰、范莱考克，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海定，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桔瑞超、吉川小一郎，美国的华尔纳……等等。他们打着探险、考察、游历的牌子，到处发掘、盗取地下文物，剥取石窟壁画。其中有的是乔装打扮的间谍，他们偷测地形、绘制地图、刺探情报，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二十世纪初夏，他们当中一些人窜到敦煌，洗劫了藏经洞发现的古文献和艺术品。奥布鲁切夫以日用品交换为名，骗去了敦煌文献一大包；斯坦因用金钱诱惑，骗了一万多件文献和艺术品；伯希和在遍阅藏经洞文献之后，骗取了精品六七千件；桔瑞超、吉川小一郎，尾随斯坦因、伯希和之后也骗走了几百件；鄂登堡不仅骗去了大量石室遗书，还剥取了北朝壁画；华尔纳晚来，藏经洞已空，然而他却“被洞窟中成千上万个优美的画像惊得发呆！”他一面谴责俄国士兵破坏文物，摧残文化，而他自己则下定决心要“剥尽这里的一切而毫不动摇，”华尔纳下了毒手，粘走了唐代精美的壁画，搬走了唐代精美的彩塑。

对于这些盗劫者，彼得·霍普科克先生称为“骗子”“强

盗”，“考古学上的贼”。他客观而公正地评论了外国强盗瓜分敦煌文物这一历史事件。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莫高窟的面貌也焕然一新，成千上万的外国旅游者、学者、专家和各国的友好人士沿着丝绸之路游览，来到莫高窟参观考察。有一位美国博物馆的专家，在她参观洞窟之后，提出要会见敦煌研究所所长，她向所长说，我已经七十多岁，能来敦煌石窟参观非常高兴，但当我看到华尔纳盗劫壁画的残迹时，我感到很惭愧，我向你们鞠躬。老太太行了个礼就告别了，这位正直而友好的美国人的心情，我们是完全理解的，赞赏的。华尔纳黄泉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去年，一位英国朋友在交谈中向我们说：斯坦因盗走了很多敦煌文物，我看，有些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这些东西应该送还中国，一时不能全还，先还一部分也可以。在日本，一位访问过新中国多次的日本友好人士，在交谈中也说：日本也有不少敦煌文物，英国、法国更多，这些文物应该归还中国，陈列在敦煌，这样敦煌文物就完整了。这些外国朋友的意见，值得赞赏，这也是今天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友好情谊的反映，我们希望有一天，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能够“完璧归赵”，在敦煌形成一个完整的敦煌文物博物馆，使敦煌成为名符其实的敦煌学研究中心。

杨汉章先生翻译这本书，做了一件好事，这本书使我们回顾了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段悲惨的历史，它激发我们热爱祖国、热爱民族文化遗存，鼓舞我们去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杨先生年近古稀，精神焕发，工作勤奋，并决心用晚年岁

月，为祖国为人民在敦煌文物事业上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他以不长的时间就译出了这本书，并得到宋子明先生的校阅修改，使这本书的译文更加完善，这是值得祝贺的。

段文杰

1982.7.12

## 译者的话

公元1840年到1949年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在阿尔泰山以东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长夜难明、群魔乱舞，赤县神州成了外国魔鬼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亡命之徒的自由王国。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下，度着被压迫、被践踏，被侮辱、被损害的苦难岁月。

中国的西疆(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甘肃省的西部)古来就是欧亚交通的要道—丝绸之路。长时期以来沟通着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华夏帝国，同时也是印度佛教文明东来的必经之路。虽然昆仑隘口万分惊险，塔克拉玛干沙暴可怖，然而商旅、使节、朝圣者、传教士、兵士、艺伎、避难的宗教徒、行乞者等的往来，络绎于途，沿途的绿洲也相应地繁荣。

自从梵司科·达伽玛绕道好望角到达亚洲以来，工具落后，运输量不大、同时又十分烦难的陆上交通、渐渐地被海上运输所替代。中国明王朝，以中原多故，无力经营西疆，使得自古以来东西方往来要道—丝绸之路渐渐地衰落，以致湮没无闻。

十九世纪末叶，西方的冒险家对这一度非常兴旺，而现今沉睡于沙底的绿洲遗址，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在这寂寞荒凉、杳无人迹的沙漠之中，蕴藏着巨大的考古学上的财富。

1895年5月的一天，在广阔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干涸的和田河沿上，一个人在慢慢地爬行，不，在蠕动。他的行动是那么地迟缓，几乎使人觉察不出他在动弹。

这个人是瑞典的探险家，亡命之徒一斯文·海定。虽然第一次远征以彻底失败告终，但在同年的12月他再度从喀什出发，以二十一天的时间走完全长三百哩的路程到达和田。接着沿着凯利亚河，完成了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样一次危险的北行，获得了大量重要的地理学上和动物学上的发现，最后满载着于田故址的大量文物和所测绘的地图胜利而归。

四年之后，公元1899年9月，在瑞典国王奥斯卡和百万富翁诺贝尔的支持下，海定再次进入塔克拉玛干。这一次他纪录下他在考古学上最大的收获：他发现了中国古代卫戍市镇—楼兰，盗走了大量重要的历史文件——这件事至今犹为中国人民切齿痛恨。这个无耻的亡命之徒在其后两次世界大战中，背弃了他的祖国和人民。1952年，当他八十七岁那年，却寂寞地离开了人世。

斯文·海定三次远征，揭开了中国西域考古新的一页，同时也引起了列强对于中国西域古代文物的争夺，直到中国最后关上大门，先后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

公元1900年5月，斯文·海定还没有结束他的最后一次远征的同时，匈牙利人马克·奥利尔·斯坦因已经开始进行丝绸之路上三次考古搜索的第一次行程，他从斯文·海定的两卷《亚洲腹地漫游》书中，得到了很大启发，吸取了海定失败的教训和胜利的经验，作好一切准备。斯坦因，作为一个地理学家，除了进行考古学上的探索之外，同时还准备以平板仪和经纬仪来填补地图上的许多空白。

二十世纪第一年的圣诞节前后到次年四月，斯坦因活动在丹丹乌利克、尼雅、安迪尔、拉瓦克这些地方，搜罗了大量中国古代文物。由于海定的空前发现，轰动了当时的考古学界，帝国主义列强也纷纷派出他们的远征队前往中国西域地带。斯坦因在

1907年再次跨上征途，进行第二次远征。这一次的主要目标是海定所谓神秘的楼兰遗址。他沿着丝绸之路东行之前，在喀什聘请了一个叫做蒋孝琬的中国师爷，作为他的助手。这个人在斯坦因第二次远征过程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骗诱王道士的一幕中，扮演了可耻的角色。

1907年3月12日早晨，斯坦因冒着刺骨的寒风进入这个城镇。当时他还知道莫高窟发现古代经卷文书这一回事，不过打算到千佛洞作顺便的一瞥和在敦煌补充一些粮食和饮水，然后前往长城向西扩展一部分作一次详尽的调查，但在到达敦煌不久，从一个乌鲁木齐商人口中，听到了几年前千佛洞道人王圆箓，在石窟中发现藏书的事，他立刻出发，越过十二哩的沙漠去到那里。这时候，一个奇迹在他的眼前出现，幸运的女神向着他显圣。

王道士是一个苦行者：节衣缩食，把生活压缩到最低的程度，成年出外，沿门托钵。他唯一宏愿，就是要重修庙宇，为菩萨增光。当前的问题是钱，他需要大量的钱。可是要把神圣石窟里的经卷文书卖给外国人，这是不可能想象的。要说服这个愚昧无知，同时对于宗教具有强烈信仰的道人，是一个艰难的斗争过程。

斯坦因和他的师爷不止一次地研究他们的战略战术，想方设法地要突破王圆箓道士。最后他们请出了“圣徒玄奘”说他们这次远道而来是奉玄奘神灵的指示，要把玄奘当时从印度圣地带来的经卷，仍旧送回原处去，这一番鬼话引起了王道士心底共鸣，王道士终于为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以此为始，他就以外国人为对象，出卖他发现的石室经卷。伯希和、桔瑞超、鄂登堡都先后成为他的顾客。由于他们付给的代价，使他对于保有的东西的价

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最后卖给斯坦因的五百七十份手卷，他坚持要逐卷论价，几经商议，以五百两白银成交。

斯坦因满载而归，英国女王授予爵士的勋号，牛津和剑桥都赠以博士学位，最使他感激涕零的是，在不久之后被接受为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满足。

斯坦因第三次到中国是在1914年，他辗转在敦煌、喀喇库图和吐鲁番区域，取得了丰富的收获，最后在阿司坦纳坟场对于包裹尸体的大量早期织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尸体上割下许多古老的、美丽的丝绸，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强盗真正做到了攫及枯骨，即使已经进入了坟墓的死人也难逃他的魔掌。1915年2月当他发送四十五头满装着壁画和其他珍宝的骆驼前往喀什时，他满怀期望将继续进行他的第四次乃至第五次的搜劫，但事实证明，这只能在梦中实现。

斯坦因第一次远征归来不久，德国人就来到这里。从1902年起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止，他们先后进行了四次掠夺，都是柏林人类文化学博物馆主办的，第一次是艾伯特·戈伦维德尔教授领导，他围绕着吐鲁番区域进行活动，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收集了四十六箱中国古代文物，包括佛教的壁画、写本和雕塑。紧接着的第二次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良，派了艾伯特·范莱考克作为他的代理人，于1904年9月从柏林出发前往乌鲁木齐。

在《中国土耳其斯坦的宝藏》一书中，范莱考克记述另一件惊心动魄、发人深省的事情：在乌鲁木齐街头，亲眼看到俄罗斯领事坐着敞篷马车疾驰而过的景象。据说这是他的习惯：在车子前面，布置了四十名骑着马的哥萨克士兵为他开路，手里的鞭子挥动在来不及躲闪的人的头上和身上。范莱考克为此向这个领事提